

【农村·农民·农业研究】

饮酒行为与一种社会整体性的延续

——基于中国云南边境一茶山人村落的调查

赵旭东¹ 衡山²

(1. 中国人民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872; 2.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饮酒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 经过长期的生活积累形成了独特的酿酒文化与饮酒文化。中国的西南边陲聚居着大量少数民族人口, 并且各民族社会也形成了兼具普遍性与独特性的饮酒文化。本文专门在这一区域内选择一个村落考察村民的饮酒行为, 姑且不去评论每种酒的味道及酒质, 仅仅品味村落生活中酒所隐含的魅力。为了对村落的饮酒活动有更全面的理解, 本文将饮酒分为规定性饮酒与自由畅饮, 并从不同的饮酒分类中诠释——酒对于村落社会中的个体及整体的某种功能, 以及在面临工业化的冲击下酒的功能是如何被转化为整体社会结构体系, 又是如何延续的。

关键词: 饮酒; 惯例性选择; 情感; 社会整体性; 社会体系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7465(2013)04-0001-11

酒是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悉的物品, 并且嵌入在人们从古至今的社会生活中。从历史的维度来说, 酒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古代中国是世界农业发达的国家之一, 中国酿酒业顺其发展, 在漫长的农耕历史进程中也不断得以塑造, 如我国文献中, “仪狄作酒” “古者少康作箕帚、秣酒” “酒自黄帝始”等记载屡见不鲜^[1]。更重要的是,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 各个民族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酒文化。

中国的西南边陲是大量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之一, 相对朴素的生活方式中贯穿着具有民族特色的饮酒文化, 笔者在2012年7月到8月底选择中国的西南边城——片马镇, 进行了田野调查。这个聚落位于怒江西岸、高黎贡山西坡, 是一个有十几个少数民族杂居的边境小城。而笔者实地调查的下片马村恰好位于中缅国境线边上, 是当地原始民以前便聚居的寨子之一, 主要居住着本土居民茶山人(属景颇族支系)、后迁民傈僳人及白族人等。平日生活中, 下片马村的村民总离不开酒。玉龙是村落中众多善于饮酒的女性之一, 她是22岁那年

嫁来下片马村的缅甸古浪坝村的茶山女子, 今年已经42岁, 是村里唯一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茶山人。玉龙在下片马村生活的20年里, 平日除了家里农活, 最大的爱好就是饮酒。即便与前夫离婚了, 她还经常去前夫的弟弟家与婆婆^①一起喝酒, 而且每次必醉。即使在自己家里, 玉龙也经常一天能喝三四瓶辣酒。2011年12月, 玉龙醉倒在床上几天, 并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 后来被前夫的弟弟发现才得救。2012年4月, 玉龙身体才逐渐好转, 在前夫的劝导下, 她去了基督教教堂, 并彻底把酒戒掉。2012年8月14日, 笔者访谈她那天, 她刚参加完信教成员间的互助种地活动, 她说自己是在做好事, 便认真地将这件事用茶山文写在了一个破旧的32开本子上。玉龙是村中众多善饮的村民中的一员, 在她的经历中, 体现了关于酒的矛盾情感。

在这个以农业为主要生计的相对传统的村落中, 自家简易酿制的传统的米酒是当地仍颇为盛行的饮用之酒。并且, 据笔者观察, 随着公路的日益畅通, 成品的瓶装酒也已逐渐融入村民生活之中, 如笔者从村落的三家小卖部中的一家了解到, 小卖

收稿日期: 2013-04-03

基金项目: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 重点项目(2008AA021204)

作者简介: 赵旭东, 男,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人类学。

衡山, 男,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硕士生, 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① 注: 玉龙嫁给了姑妈的儿子, 即她的婆婆也是自己的姑妈。

部每天销售的商品中,酒的销量最多,不到一百人的寨子中,一天可以卖出十来瓶辣酒^①(卖的最多的是8元一瓶的大营山麦芽清白酒),至少一件啤酒(一般均为大理啤酒,一件十二瓶)^②。因而,现在的村落中,自家酿制酒与成品酒共同构成人们饮酒行为的对象。

面对着村落中大量的酒的消耗、村民对酒的复杂情感,本文除了论述村民生活中难以割舍的酒的的同时,还将阐释酒中所隐含的魅力和给人们带来的忧虑。对于个人来讲,饮酒的习惯脱离不了生物性的影响,但对于社会中的个体及整个社会有机体来讲,饮酒已演变为一种影响一个地方社会运转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人与人之间及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发挥着某种功能性的作用。在这里,酒是一种存在性的实体,社会成员间的情感体系、整个社会体系、整个社会结构秩序都有它的价值性展现。因此,本文的目的不在于酒本身的品质如何,而在于对村民饮酒生活的延续与转变的理解,在于饮酒行为的潜在意涵。

一、村落与规定性饮酒

村民善饮是村落中的一个延续至今的事实,饮酒已经演化为人们有序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带有所在社区的文化特征。所以,饮酒并不是简单的个人喜好问题,也不是纯粹的任意而为的行为,人们根据社会需要及既成的惯习形成某种形式的饮酒准则,使人们的饮酒生活具有某种相对明确的秩序,进而可以说是一种结构性的饮酒行为。或者说,依据拉德克利夫·布朗对原始社会一些文化现象的结构分析,酒也是一种存在性的实体,“发挥着某种使一定数量的人以有序群体的形式在特定的环境下过社会生活的功能,而这种功能会对社会整体有所贡献”^[2]。为了便于理解村落中酒的结构功能及饮酒行为的社会内涵,笔者先定位于常人容易察觉的有明显内在规定的饮酒行为,如礼尚往来需要酒来表达“礼”,节日习俗需要酒的调剂,家庭农业生产需要酒的辅助。

1. 待客饮酒

饮酒的准则首先凸显在饮酒互动的基本“礼”中,这种礼形成于人际之间的互动行为,又深化了每次的互动交往。村落内,茶山人和傣僳人不分男女大都会喝酒,酒自然不会是人们交往互动的障碍,反而成为了一种交流工具而带有地方普遍性的

色彩。尤其是在互动交流中,村民们形成了和共享着一套“饮酒之礼”。

“饮酒之礼”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当地的待客以酒的习惯。据笔者观察,从传统习俗来讲,如果有人来家里闲聊,傣僳人与茶山人必会用家里的酒招待来客。不过,村内两个主要民族的待客以酒的基本礼俗略有不同,客人到傣僳人家里闲聊,傣僳族主人会倒上一满碗辣酒或者白酒,递给来客人中的年长者,年长者喝一口后,再递给身边的其他人,依次下去,每人都喝一口,主人则喝下留在碗中的最后一口,共饮一碗酒则成为傣僳人之礼;而进入茶山人家中,茶山人一般用二两多的酒杯倒满辣酒或者白酒,然后一杯一杯的分给每一位客人,在主人的礼让下,客人一次性将杯中酒全部喝完,随后主人再分别为大家倒满第二杯,从第二杯开始,大家开始较随意的喝,但是如果客人想离开,必须将第二杯酒喝完方可离开。现在的这种茶山人习惯是从以前用竹筒盛酒时期的进门酒与出门酒演化而来,即客人进门后,主人先将酒倒在家里的一一个个竹筒盖内,然后一一端给每位客人,叫进门酒;客人离开时,主人再依次倒给每人一杯,喝完后客人才可离开,叫出门酒。所以,到茶山人家做客,两杯酒饮尽才算礼的完成。有进有出,相当于有始有终,主人的待客情谊寄于其中,这也是一种对饮酒人的关于礼的结构性的制约。而傣僳人共饮一碗酒,彼此的情谊溶于共同的分享物品中,也是一种集体性的约束共识的体现。

尽管两民族的饮酒习俗不同,但对在场群体成员的礼的制约作用贯穿于饮酒始末,人们照此完成一个情景中的互动交往,傣僳人集体一碗酒,茶山人有始有终两杯酒,从而建构了人们日常生活待客以酒的社会秩序,饮酒也成为社会体系中的一种结构性行为。人们延续而来这种惯习演变为地域性的“礼”,在互动交流的场域中,进而转变为一种结构性的表达方式。在这个多民族杂居的聚落中,人们见面的场景类似于《乡土中国》中所引用的当地人话语“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吗?”^[3]下片马村的主客见面及客人进场出场都没有示意性的嘘寒问暖及倒出底细,第一口酒及第一杯酒的喝下成为独特的见面问候言语

^① 注:在当地人的观念中,酒主要分为四种:啤酒、辣酒、白酒、泡酒。其中,辣酒就是人们熟悉的在城市中所出售的瓶装白酒。

^② 引自衡山在云南省怒江州2012年8月19日的田野日记。

另一种表达方式,也不同于中原的熟人交往,这是一个实在性的过程,溶于酒中的彼此情感随之逐渐被人们体会。所以,这种结构性表达方式既使人们闲在一起的饮酒活动形成礼的秩序,又加强了闲在一起的彼此的聚合。在礼的约束下,机械团结便成为集体整合的关键因素。饮酒自然处于一种整体性的情境下,加之酒在集体场合的共同畅饮的具体特点,酒便是这个村落社会中具有共享性的物品,正如一位善饮的村民曾经讲到“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不喝酒,有伴来了我才会与他们一起喝”^①。

2. 换工、饮酒与整体性的社会呈现

基于自然生产条件的限制与历史演变而来的农耕制度,换工是当地日常农业生产的重要形式,也是存于当地的重要交换形式,即村民之间互换劳动力以完成农作种植。劳动力的互换并不是绝对量上的等价交换,当请工者在还工当天出现特殊情况而不能还工时,被请者则不会计较,村民之间自觉践行的是完成集体耕作的互惠性原则,像肯尼亚的 Giriamia 地区的村民那样,人们不仅只顾打下自家的椰子,即使椰子树很少的人也会帮别人去打椰子,^[4]一种集体共享的准则在此成为了互助的背后驱动力。片马村的劳动交换致力于完成村落成员的各家农业活计的共同目标,如村民少林 2012 年初将腿摔断,到农忙季节时家里的农活落在妻子的肩上,但是换工群体中的村民并未因他家提供的劳动力减少而减少对他家的帮助,相反,农忙时,加入他家农田劳动的人有所增加。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片马镇才逐渐修通公路,而公路不通时,没有成品酒与饮料运进来,村民们换工干活时除了带去必备的干粮外,自家提前酿制好的白酒或者辣酒也是换工的必备物品。但村民们从不带水,当地人认为,山上有水源,大家可以随意到旁边洼子里(即水沟里)去喝。换工中饮酒并不是为了在田地里娱乐,而是要在酒礼的引导下组织生产活动。每次换工劳动期间会有专门负责人为劳动者倒酒,负责人每次给干活的人所倒上的酒不超过二两,并且倒酒的时间具有规定性。上午劳作前倒一杯酒,表示大家要开始劳动;中午吃饭前倒一点,提示干活的人准备休息吃饭;吃完饭后,大家闲一下,负责人再次倒酒,意味着下午劳动即将开始;晚上六七点钟,为大家倒上最后一杯酒,表示今天可以收工回去。现在公路畅通后,饮料和成品的瓶装酒在一些家庭发挥了以前手工制酒的功用,并且遵循着这一饮酒原则,劳动秩序也在这样

的情境中一直延续。

在常人看来,酒是与休闲娱乐登对的饮品。但在村落中,它出现在换工或者劳动中,并且发挥了劳动行为指示性功能,从而推动了一种劳动秩序的建立与持续,以致它的替代品也遵循这一原则而被人们所利用。从积累而来的换工实践经验来看,酒是村民换工所需物品的常规选择。换工之中的劳作、休息、吃饭等行为全在饮酒之进行中,演变为地方社会数年来的惯例,进而成为维系一种社会整体性秩序的正常运作的纽带。也就是说,酒推动着一种惯例性的形态和维护着另一种结构性行为的延续。饮酒在其中便形成一种社会功能,“具有功能性则意味着部分对整体有所贡献,这种整体性的活动则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社会的生活又是一个社会结构的运转”^{[2]207},部分对于社会整体性活动的贡献也就是对社会生活的贡献,进而成为促使整个社会结构的运转的影响因素之一。

那么酒何以成为一种规范性的惯例而使换工秩序甚至社会结构体系得以持续?在村落中,酒可理解为一种公共表征,它存在于使用者的环境之中并为所有人共享,也使表征的使用者与生产者之间有所交流^[5],即换工者与请工者、换工者与换工者之间的互动,群体间的联系也由此建立。村民有待客以酒的习惯,酒成为人们相互交往的工具;村民们过节,尤其是过当地的新米节时,特地邀请与自己换工的工友们来家里饮酒而且被邀请者不需送任何礼物给请客者;在农业生产的换工行为,村民交换的不仅是单纯的劳动力。根据莫斯关于礼物的理解,生活贯穿了一条出于义务、慷慨或者挑战的送礼、收礼和还礼的持续之流^[6]。村民准备酒邀请除了亲戚之外的互相换工的人,共享丰收所得的粮食及精心而酿的酒,以表感谢大家帮助劳作之情。这便如同夸富宴中的邀请的义务,村民因为别人的帮助得以完成一年的耕作与收获,为了感谢别人的给予而邀请大家共享劳动成果,并且只要有人邀请去喝酒,村民不会拒绝,因为这是接受了别人对自己劳动的回报。这样的给予与回报的交换首先是使交换的双方产生友好的感情^{[5]341}。村民之间的情感在这样的交换中得以表达,邀请喝酒中包含了邀请人的感情,过去共饮则表示出对邀请的接受,邀请者在社会中的情感存在得以满足。不仅如此,这样的交换不断进行,即使村民们日常生产秩

① 引自衡山在云南省怒江州 2012 年 8 月 11 日的田野日记。

序得以延续,而且将村民的生活秩序也纳入其中,成为整体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也就说结构性饮酒是村落集体性的必然体现。

无论是在饮酒之“礼”的准则中,还是在农业生产中的换工饮酒,都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惯例性选择。由于普遍性、共享性、连续性,它与社会整体已不可分割,经过人们经验性的雕琢,此刻的饮酒不再是单纯的随性而为的事情,它是人们结构性生活的结晶。村落中的规定性饮酒是一种情景秩序的建立,也是一种秩序对另一种秩序的维护,一层一层向外扩散,最终凝在人类的意识层面结为一种集体意识。而“集体意识是社会团结的基础,使人们结合成为一个有序的社会整体”^[7],从而使社会实现为一个有序团结的社会体系。

二、村落与相对自由的畅饮

无论在村落,还是在现代化的城市,人们消耗的大量酒多是在闲时的餐桌前。这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喝酒场景,没有特定的杯数及具体的时间规定,脱离了对酒的规定性限制,人们依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共饮的人、共饮的场合、共饮的时间及饮酒的多少,如村中一位善饮的小伙子讲,“他经常喝酒,但是自己在家不怎么喝。大家闲时在一起就可以随便喝了,而且喝得非常厉害,不管是自己泡的白酒,还是买来的辣酒,寨子像他那么大的男子,闲时聚在一起喝一两斤都没问题,有些甚至能喝三斤。有一天,他和寨子里的几个人去表姐家吃饭喝酒,七八个人一直喝到早晨4点多,大约饮了两盆自己做的白酒,五六瓶辣酒,还有一件啤酒。只要大家闲时,这样的喝酒在村里就是常事,尤其是在冬天,村民不用做活,隔两三天一些人就凑在一起喝酒,这一时期几乎能消耗掉自家全年酿酒量的一半以上。”^①而对于饮酒的个体来讲,这种相对自由的饮酒行为是基于彼此情感的自觉而造成自身对酒的偏好性选择的结果,还是个人偏好性选择与整体的偶然性的或者必然性的契合?

酒作为一种公共表征,完成了生产生活中交换,使人们之间互动交流而达到群体性的互惠,进而形成一种结构秩序。而在没有特殊规定约束的饮酒场合中,人们彼此间的情感表达更加凸显,因为从个人情感上说,闲时的自由畅饮是基于相对个人化的偏好性的选择。此种场景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对酒的情感投入会加强,酒也会

演变为社会情感得以维持的媒介物,这种社会情感继而变为“依赖情感”^[8]。酒在社会情感之间的依赖作用,使得其社会功能增大和社会价值增加,社会的有机团结可能成为主导的社会整体的维持力。笔者在这一节将选择三种比较特殊的情景来说明酒在社会结构体系中的作用,一方面这三种情景体现出酒在人们不同时期的展现而产生纵向的理解,另一方面这三种情景是展现酒的聚合的最好例证。

1. 小孩子的饮酒

人具有社会性,处于某种共同认同的文化中,刚出生的婴儿是一个生物性的个体,他(她)必须渡过一个特定的社会化时期才能融入社会文化系统之中。即从个体的生物人长成为社会人,并逐步适应社会生活的社会化^[9]。村落居民的酒文化教育应启蒙于孩童时期,尽管是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时候,每家粮食产量不多,但是总有一些留给酿酒。饮酒时,大人们时常刻意将小孩子抱在身边,尤其是在小孩子一两岁时,祖父母总有机会给小孩子喂一口酒。所以,在当地,常有还不知道什么是酒的四五岁的小孩子就能学着大人们的样子能喝上半杯啤酒或者一两辣酒,甚至出现过小孩子酒醉的事情,而且严重到差点丧命。村民讲述,“董副、褚强、董副的弟弟绍宗小时候因贪喝酒就差点没命。那年董副5岁,褚强4岁,绍宗3岁,当时村里每户人家都很贫穷,小卖部里没有酒卖,每户人家都喝自家酿制的白酒,董副的父亲是当时的大队长,每月国家会发给他父亲一条金沙江烟,一壶(过去的军绿壶)辣酒,大约2斤。正值农忙之时,家里的大人都不在,董副平日常见家里的人们聚在一起喝酒,便知道酒放在哪里。那天他找来褚强和绍宗把家里的那壶酒拿出来,学着大人的样子,给自己倒了一小茶缸,给褚强和绍宗每人一瓶盖酒,就这样三个孩子开始喝起来,三个人轮流倒酒。最后,三个人将整壶酒喝的只剩下一个底,醉倒在一边。”^②

在当地的家庭社会化教育中,饮酒无形中成为孩子进入社会的家庭教育课程之一。在皮亚杰的理论中我们知道,儿童的自我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其中,前运算阶段,又称前逻辑阶段,这时儿童开始对外部世界做出行为性反应,表现在儿童的延缓模仿、想象或游戏之中。^[10]此阶段,儿童扮演与模仿的对象主要是与自己亲近的人,大人

① 引自衡山在云南省怒江州2012年8月20日的田野日记。

② 引自衡山在云南省怒江州2012年8月29日的田野日记。

们在孩子面前的饮酒行为演变为大人们对孩子认知的自觉的社会化教育,也是孩子作为回应而做出一定行为的模仿范例。在孩子成长的初期,孩子成长于大人的饮酒世界中,逐渐形成对饮酒的感知,随着自发的反射和形成的习惯再到智慧,逐渐形成认知,即一种对饮酒行为的逐渐同化过程^{[10]6}。当孩子长到四五岁时,正处于前运算阶段,孩子有了独立行为的能力,能够对大人们的世界进行模仿。而且随着孩子的认知能力的发展,孩子的模仿不仅是表象,而且是内化了的模仿,成为日后思维的准备^{[10]44}。村内孩子饮酒是一种自由性的畅饮,孩子们还不懂得饮酒的准则及酒中的社会意涵,但是孩子们这种饮酒行为却为成人世界的映射,也是孩子将饮酒行为纳入自己的思维体系的过程。在成人的世界中,闲来的共同自由畅饮可能是基于个人偏好的自我选择,共同存于一个场景的个体们体验着彼此的情感。但对于只有几岁的孩子来讲,成人饮酒的情感体验及饮酒中情感性语言不太可能成为他们的模仿要素,他们模仿的方面更可能是那些反复出现或者对他们影响最深的方面。多人共享是此则案例中孩子模仿成人世界的最突出方面,如此次饮酒事件中,孩子招呼同伴共饮一壶酒,这种举动显然是根据平日家人的共饮场景模仿而来,随之反复的出现它逐渐融入到孩子的行为体系中,演化为孩子的自觉意识下一系列行为表现。并且,孩子的模仿中所形成的自我意识包含了与他者的共同在场,也就是村民们常常经历的闲在一起的观念。因此,小孩子关于酒的认识是:酒不是纯粹的个人性物品,饮酒不单是个人的行为,而是存于与他者的互动之中。虽然没有成人那种完整人格体系中的情感需求,但是这种模仿或者是村落社会生活预先社会化的饮酒行为,不自觉之中使孩子意识多个人之间关系的存在,成人们的情感性体验在孩子认识中先逐渐演变为印象中的惯例行为,即闲在一起的饮酒行为是小孩子们最先体验的。

2. 断裂关系的整合

在相对自由性的场景中,人们自由结合于相对随意的饮酒活动,此刻的饮酒活动是人们依据个人的偏好而选择的结果,即各个具有个体性的自由结合形成了不同的聚合,由此也创造了一种选择性的情景。^[11]而这样情境中的个人情感性交流的凝聚力最强,根据拉德克利夫·布朗关于社会结构秩序的维持主要源于人们思想与情感的心理假说,社会群体的存在要靠其凝聚力来维持,而凝聚力则直接

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能够将群体成员彼此粘合在一起的集体情感体系。^{[8]213}在情感性更强烈的饮酒场合中,个人情感的作用在酒的引导下而持续了整体的秩序。但是,个体性的选择的决定作用是社会整体性维系的唯一关键点是值得质疑的,尤其是在一种情感性关系结束后,关系的再续维持需要的是超越情感的因素的主导。

笔者调查的村落是一个离婚率较高的地方,出生于本村的村民中有10个人现在已经离异,并且离异后的夫妇仍继续生活在村内的现象较普遍,但是夫家与妻家的联系并未因此而断裂。在调查中有这样一个案例“村中的中三益是傈僳族人,以前不善饮酒,八年前与第二任妻子结婚后才开始嗜酒。第二任妻子是缅甸茶山人,三十年前嫁来本村中,而第二任妻子的丈夫便是本村的一位茶山人,第二任妻子与丈夫离婚后便居住在中三益家的后面。嫁给了中三益后,妻子与她第一任丈夫家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情感关系的破裂而断绝。他与二老婆结婚后,他家便经常与二老婆的前夫的亲戚们一起做活,而且大家做完活大都会聚在一起喝酒,每家都会去,中三益家自然经常招待这些亲戚,亲戚们抱着酒大多喝个痛快才离开,一个晚上至少要消耗七八瓶辣酒,而且喝高兴了大家便一起唱歌,有醉意了便躺在一旁休息。中三益由于居住在寨子的山坡上,以前与住在坡下的妻子的这些亲戚私下聚在一起的机会不多,自从娶了第二任妻子后,他与亲戚们也逐渐熟悉,并且酒量也大增,成为茶山人大家庭的一份子。”^①因为饮酒的缘故,村落中原本并不常相聚在一起的人有了彼此的密切交流,从而架起了一段关系网络。但是,我们应注意到,这一关系建立前,关系网中的关键人物已经处于断裂的两端,前一段破裂前的关系中包含大量的情感因素。当然,当其破裂之后,维系其继续存在的因子中,我们不排除个人偏好性的感情作用。但是,延续两个家庭的和谐秩序,单靠个人性的动机,恐怕难以维系两个群体的关系,甚至整体的社会系统秩序,如尼德姆所言,仅仅是偏好性的选择,不可能有明晰的连续性,由而影响社会系统^[12]。已经断裂的家庭亲属关系,因为饮酒的调和再次联系起来,借助饮酒活动的聚集,以前的姻亲关系转化为另一种类的亲属关系,两个家庭群体的关系得以建立。所以,酒作为当地人需要共享性的物品,通过

① 引自衡山在云南省怒江州2012年8月18日的田野日记。

这种共享性,人们之间以前的亲属情感得以存续,而人们如此的维系彼此的情感本质上则是涂尔干所讲的人们对群体的一种集体意识^{[7]42}。一个相对确定的情景,而这种集体意识间接支配了人们饮酒活动,并使之成为一种惯例性选择,即整体性的意识促成了村民们的自由选择的畅饮活动。

魏晋时期,出现“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的社会现象,并且曾经一度引起普通大众的模仿^[13]。文人们饮酒也是在相对自由放荡的场景,甚至可以衣不穿、帽不戴,冲破礼教的束缚,如陶渊明那样采菊东南下的潇洒饮酒。从表面上看是文人的偏好,即个体性的体现,因为这种行为打破的是整体的封建统治的礼教秩序^[14]。但是,在这些人冲破礼教的外表下,实则是他们太相信礼教的表现,是他们关于国家整体性的思考,因为在相对动乱的时期,个人利益相互交织,在各方利益冲突的情景中,他们饮酒放荡实则是对集体性的另一展现。在偏远的小村落,村民没有古代文雅之士的高瞻远瞩的洞见,不像文雅之士那样,做出某种行为有深刻的内涵。但是,同样作为一个社会的个体,并且同样享受着自由饮酒的随意,一碗酒、聚在一起、随性而饮仍是人们对社会整体追求的体现。所以,群体关系的维系,不单是表面上个人性的情感表达,而且是一直存于社会人意识中的整体性的表达,只不过村民的饮酒行为是较直接的转化为整体性的体现。并且,在整体性的意识下,人们会再次感受到快乐、温情等等,由而情感体系得到再次整合,继而社会整体产生新的融洽状态。

3. 外人的梦与村内的酒

村落居民世代依附于土地,即使在偏远的少数民族边境村落,以农为生的世代定居的生活常态仍未改变。而“自成一体的乡村闭合性的养成大多是与共同这两个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聚在一起共同空间是一个少有差异的共同体或者社区”^[14]。一旦成为某种共同体,意味着在一定地域范围的人们整合在一起而形成共同的社会认识及社会情感体系,进而存续于整体的社会结构秩序之中而成为一种个体与整体相融合的状态。生活于此的人们对自身及整体社会产生集体性的意识,最终又集成基于共同认识、情感及价值的一种社会认同。“根据帕森斯的行动理论,一个社会行动的普遍理论而试图把社会、文化、人格以及个人有机体带入到有意义的关系中的时候,认同机制就成了一个关键。”^[15]在村落中,无论是规定性饮酒还是

自由畅饮都隐含着人们的惯例性行为,正是这种惯例性选择下的行为的不断延续,一个地方社会自然随之成为一个少变化的连续体,并且连续体中随之产生强烈的社会认同。基于当地人对酒的共同认识及酒在村民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作用,那么饮酒就可以被看作是村落社会认同的内容之一。

笔者曾经走访了片马镇的景颇寨子和傣傣寨子,两寨子合为一个行政村,村主任是从六库迁移过来的汉族人,50岁,他在32岁的时候迁来片马,他将自己为何来此建构了一个传奇性的故事。他讲到,“在31岁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中的茅草屋里走出来一个老头,对他说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有700年的历史了,并将这个地方送给了他,请他来后把这个地方管理好。于是,村主任梦醒后开始四处打听梦中的地方,直到他32岁那年,从家乡的一位来过片马的老师那里找到现在的寨子。由于当时这个寨子人员稀少,他便顺利在这里办理了落户手续,带领全家搬过来。为了与当地人能沟通,他来后抓紧学会了傣傣语和茶山语。为了能和村民熟悉,便邀请村民来家里吃饭,但是他几次发现,每次村民来自家吃饭都兴致不高。最后他才知晓,村民们来他家吃饭时只给准备饭菜,从不备酒,便高兴不起来。由于村主任是医生出身,从不喝酒抽烟,但了解过情况后,他开始学习酿酒,并且请当地一位茶山人教师和另一位村民来品酒,时间久了他的酿酒技术逐渐闻名于村落间,并且偶尔有村民来他家要酒,村民来家里,他也会与大家先畅饮几杯。后来经村民选举,他当上了村委书记兼村长。”^①高川成功地将自己虚幻的梦变成了现实,在这个过程中,酒成为他进入的有效手段。作为一个相对闭合的村落,必然存在一套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习俗与规范,外来者进入这个闭合圈引入与渲染传奇性的梦境故事,并不能取得群体的一致认可。但是,酒作为当地社会的互动交流的工具,在村内具有普遍的认同性,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工具。外来者通过酿酒与共享酒,满足了个人情感的需求,在村落之中找到了情感的存在归属,在无形之中也使他与大家团结在一起。所以说,饮酒不单是个人情感的偏好性选择,更是人们长期生活阅历中的内化而成的社会惯习。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具有两面性,他既是一个个体又是一个人,其中个人是社会关系的合成^{[2]21}。由而一

① 引自衡山在云南省怒江州2012年8月23日的田野日记。

个人要进入一个新的社会整体之中,就必须融入这个关系中,或者在社会结构体系中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因此,在饮酒具有塑造社会秩序的社区生活中,人们对外人的看法在不自觉之中受到饮酒的惯例性约束而成为外人进入的切入口。同样,人们的饮酒行为是对群体性的追求,而以酒为选择的惯例性行为也成为建构的村落社会认同的内容之一,从而增强村落社会生活的聚合力。

总而言之,无论何种形式的自由性畅饮,从形式上看,它展现了饮酒的随意性。例如,即使在深夜、在门口,只要大家凑在一起便可畅饮。从过程上看,它呈现的是多人一起闲的场景,在这个群体的场景中,人们通过自由的畅饮交流了彼此的情感,找到了个人的情感依赖,在人们寄托个人情感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并且演变成为一种生活中的常态。由于世界是独立于我们既成事实,在一个具体的社会中都会有一系列具体的预设和习惯模式,由而必须学会掌握习俗,也就是文化的习得或事物的“习以为常”^[16]。饮酒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的既成事实,在不断的延续与发展的过程中,造就了一种进入与延续性存在的社会认同方式。彼此的情感依赖与社会的整个体系均在这种习以为常的饮酒中得以强化。所以,从根本上讲,规定性的饮酒与相对自由的畅饮的背后均隐藏的是对个体对于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维系。

三、嗜酒、死亡与信教行为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关于一种饮酒行为并不总是呈现出对于某个社会的特殊功能,饮酒对个体及社会的消极方面也总是夹杂在其中,尤其是嗜酒成瘾在中国已不是一个新问题。在历史上,夏桀与商纣均因嗜酒而亡国。随后有周公颁布《酒诰》于天下,人们不得聚众饮酒。在当下,据我国首份民众健康饮酒状况调查报告《2007年度中国25省民众健康饮酒状况调查报告》统计,中国有超过5亿人饮酒,高达65.39%的受访者健康饮酒状况不合格;25.58%为基本过关,8.52%较为良好,仅有0.51%的饮酒者具备正确的饮酒观念^①(健康饮酒中国行动组委会,2008)。因而,这样的饮酒危害性也随之日益深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并且人们的行为随之而改变。

1. 饮酒与死亡

现代性不断渗透在世界各地,即使在这个边地

村落,在外力的推动下,也难以保持自己原有的传统一成不变。片马地区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兴修公路,各个村落与外界的联系开始密切起来,受着外界现代发展的影响。基于当地丰富林木、矿产资源等的吸引,外来的经商者最先利用便利的公路设施谋求经商之路,带来经济效益的观念,商业、利益、金钱等观念在这一时期似乎更加盛行起来。对于当地人来讲,兴修公路、外来商人开采当地资源与建设工厂的同时,也导致了部分田地遭到破坏,村户的粮食产量相应的在这种破坏中下降,即村民制酒的原材料相应减少。而公路的畅通又为村民带来了日常生活的便利,物品变得更加容易获取,近则在村内小卖部即可买到日常所需物品,远则在镇里的超市便可购买种类相对较多的各种商品。最重要的是,村民不用费力、费时酿制各种酒,直接用现钱便可以买到各种各样、各种价位的酒。修路后的变化为自家酿酒带来不便,但以便利的方式满足着人们的这一需求,总体而言,这种变化没有影响到村落所供给的酒的数量,反而增加了人们关于酒的消费。

在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中,我们可以知道,个人人格与社区及物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后者支撑着前者的性质,货币经济则松解了这种个人人格与物品及社区的联结,扩大了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同时也扩大了物的使用价值^[17]。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带来的货币获取商品的途径中,饮酒中转变的不止是表面的种类,而是相对以前十分注重集体性的个人自主性的扩大,而酒的消耗也在同步的扩大。而对于个体来讲,消耗的增多,越来越表现为一种关于酒的依赖,医学伦理学将酒精系精神活性物质,可以影响人类情绪、思维、行为及意识状态。长期嗜酒者可出现酒依赖综合征,即导致了耐受性、戒断症状和冲动性觅酒行为^[18]。而长期的依赖性有必然会影响到村民的身体健康,并且依赖性饮酒的危害性已经明显地发生在部分村民的身上。在下片马村落中,居住着55户家庭,总人口不到200人。十年前,村民的人均寿命为70岁左右,但是现在村内60岁以上的老人只有8人,其中两名男性。近六七年间,不到50岁便死亡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大多与嗜酒有关系。如村民们讲到“村落中,十年内大约有八个人死于饮酒,有男有女,并

^① 健康饮酒中国行活动组委会,2008,《2007年度中国25省民众健康饮酒状况调查报告》,北京

且村民们现在普遍认为,年纪较轻就死亡的人有70%是喝酒喝死的”^①。

据笔者的实际案例调查,从2004年到2012年村民们每年都会经历或者听说有一例这样的死亡。从生理学上讲,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酒瘾,出现饮食结构的改变,食欲不振,影响到了身体所需物质的摄取,故出现慢性酒中毒、酒依赖等^[19]。随着饮酒死亡事件的增多,村民也逐渐意识到酒对自身健康的威胁,死亡案例的增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村民的恐慌,更重要的是质疑了村民们关于饮酒的传统观念。前面章节中已经提到,酒是集体农业劳动成果的产物,在村内的饮用中具有共享性。但是,商品经济下的成品酒,一方面方便了村民对酒的获得;另一方面,成品酒改变了传统酒的性质,它抽离出村民能感受到的从材料准备到酿制的过程,削弱了因共同劳作而使酒带有共享性的特质。酒成为一种通过经济交易而获得的物品,从而具有商品的特性及经济的色彩,也即一种个体性的经济呈现^[20]。因而,传统酒的共享性难免会受个体的经济利益所限,具体表现为完全依赖于个人的需求而增多的酒的消耗,酗酒的现象恐怕不再仅仅发生在特殊的个别人身上,最终产生对村民自身生存的威胁。

2. 带有健康意识的饮酒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人们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方面^[21]。在村落受现代性影响的情景中,传统酒的性质发生了改变,酒的个人性需求增强,集体共享性受到威胁。而面对一种后传统秩序的入侵,“我将如何的问题”,必须在有关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如吃穿住行的决策中得到回答^{[21]15}。村民们在意识到饮酒会带来的死亡后,也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关于自己的生活的反思,首先反映在意识层面。

在笔者的调查中,村民少将与腊印是善于饮酒的村民,他们近几年开始担心自己会像那些死去的人一样,某天突然离世,少将讲到“我也害怕将来会像王利和那样死掉。酒喝多了,到年纪大一点时可能就会手抖。所以,我一直坚持没伴时不喝酒,有伴才喝酒,这样的话就不容易上瘾。现在,我白天喝酒时,吃饭可能少些,但晚上喝酒时,总会吃的多些,而且只要喝酒了,我睡前一定会吃一碗饭或者自己煮一碗面吃。但是,估计这辈子我不会戒酒,大家聚在一起共同喝酒唱歌,才有生活乐趣。”^②腊印讲到“家里酿的白酒不会醉人,而且不

伤身体,我喝多少都不成问题。但那些买来的辣酒不能多喝,我一般喝三瓶就会醉的。我一般在家都会喝母亲酿的白酒,但家里酿制的酒一般不够喝,所以经常也会买些辣酒。不过,如果每天都喝三四瓶辣酒的话,我害怕自己活不过40岁,所以现在一般有人叫我过去,我才去喝酒。”^③在他们的意识中,大量的饮酒容易伤害身体,并且担心酒酒精中毒,从而对自己的饮酒行为产生不同的自我约束。

乌里希·贝克曾提到,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22]。即便是在人数不超过两百人的村落中,人们仍旧有一种危机意识。并且,随着现代社会中信仰体系的世俗化,具有能动性的个体逐渐改变了他们看待自己人身安全的方式,而导致了一种他所说的“风险杜绝模型”,即个体将基于对生存的预计与环境风险联系在一起,由而有了一种关于健康自身安危的认识^[23]。而与健康有着密切联系的关乎个人命运的抉择,在这种情境中便日益明显地施压在个体之上^{[23]47}。由而产生的这种意识便具有矛盾性,村民既有对死亡的恐惧,又有对酒的难以割舍之情。在这种矛盾状态中,应对性的转变则有助于减轻关于健康的压力。

饮酒已经为人们带来担忧,甚至可以描述为与现代生活相关的焦虑,属于村民个人性的行为,而且与自我的情感相关。如果单纯从饮酒生活中来看,村落的饮酒是村民的一种情感依赖,而焦虑是一种心理状态,它必然与酒中的情感有某种关联,并且这种关联是一种负相关,即焦虑的出现会威胁到已有的饮酒中的情感依赖。由于焦虑又与个体所发展的整体安全体系有关^{[21]48},所以在以往个体惯例上发展出的本体安全体系会受到这种焦虑的威胁,即表现出对饮酒的自我约束。关于酒的焦虑在无形中又会威胁到已建立的因酒而产生的社会认同,质疑了以往的文化常态,为了消减内心的焦虑与维持所熟悉的世界,保持生活的连续性与整体性,严格践行大家一起饮酒则成为一种善饮者面对危机的应对策略,既杜绝了个体饮酒的肆无忌惮,又延续了以往的常态行为而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生活稳定。

① 引自衡山在云南省怒江州2012年8月27日的田野日记。

② 引自衡山在云南省怒江州2012年8月24日的田野日记。

③ 引自衡山在云南省怒江州2012年8月20日的田野日记。

3. 信教行为

片马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有关于鬼神的传统信仰。他们认为,自然界中存在着鬼,凡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能解释的一切现象都归之于鬼。由于当时的生产力低下,生活贫困,祭祀鬼神要消耗家里的牛、肉、酒等,十分浪费,而且得了疾病,有时鬼神并没有起到作用,许多人被剥夺了生命。而传教士宣扬“永生”的观念,信教也能够使人们摆脱贫困、落后和死亡的威胁,而且基督教在当地基本的教规便是不能饮酒,进而信教者的粮食不再耗费在酿酒上,粮食比较充裕,生活比较好过。但是,一旦信教不能免除人们的危险,人们便会恢复到以前鬼神信仰。因此,当地人对于基督教总是处于一种摆动的状态。当鬼神不能给予他们生存的保障时,人们通过信教寻求永存;当信教不再满足人们的安全需要时,人们又会恢复到以往生活习惯。

人们面临着酒而带来的对身体的危害,一部分人在转变了以往的饮酒意识,但是饮酒的行为仍在延续。在村内还有一部分人,采取了另一种的应对危机的行为,彻底的改变了以往的饮酒行为,即将酒戒掉。而在笔者的调查中,基督教在村民的戒酒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戒酒的动机中,基督教的教义恰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本文的初始,笔者便介绍村民玉龙的饮酒经历,玉龙是村里唯一信奉基督教的茶山女子,她是村里通过信教而戒酒的唯一女性,其余5位均为男性。玉龙说从2010年8月开始,她喝酒比较猛烈,几乎是早上一瓶,中午一瓶,晚上两瓶,干活累时喝,不干活也喝,醉了就倒在床上,既不手抖,也不吐,只是晕晕的。到2010年腊月的一天,她酒醉昏迷了三天,后来家人发现及时,挽回了她的生命。身体稍微好转后,前夫劝她说“你身体这样子,肯定是哪都有鬼缠着你。老天比鬼大,鬼怕老天,鬼是偷人性命的小偷,你信教后就成了老天的孩子,老天会帮你收拾鬼,保护你的。不然鬼咬住你的命后,你就会死掉。有老天在,鬼就不敢咬你了。”从2010年4月开始,玉龙不再喝酒,开始去教堂。现在已经不再饮酒,并且身体已经完全恢复。^①当酒对人们的身体造成危害及人们认识到这种危机时,信教成为当地人意识中缓解酒对个体危害的有效途径,信教成为了一种规避风险的机制。

村落中的基督教将饮酒归为坏事,只有不做坏事,多做好事,才会得到平安。对于焦虑未来的村民来讲,要想获得身体的安全及消除心理的焦虑,

不做坏事便是第一步。所以说,这样的教义内容正好契合处于焦虑状态的村民的需要,帮助他们维护身体的安全。信教成为当地人满足个体利益需要的工具,村民的信教行为从而具有工具合理性的色彩,即以期望的后果为条件来实现自己目的的行动,注重行动的条件和手段对于目的的可能性^[24]。但是,韦伯也指出,他所划分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行动属于“理想类型”,在现实生活中难以以纯粹的形式出现,任何一个现实的行动都含有这种两因素^[25]。从村民信教的直接原因看,信教体现了一种工具性,但在这种工具性背后,社会的价值因素是否会消失呢?前面已经介绍到,村民饮酒的内涵是关于整体的情感依赖,是对社会整体秩序的追求,饮酒不仅规定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节奏,还建构着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对整体社会便带有一种控制力。现在,以前善饮的村民的不再饮酒,相应地人们之间因饮酒而建立的情感联系会削弱,而且酒所带有的控制力在信教者身上消失。但信教的村民也并非一个单个体,理性的组织化宗教通过村民自古便有的生存意识,而产生凝聚群体的力量,并且同样对村民有控制力,村民在整体中体验的存在感便在这种有组织的活动得到延续。

普通村落居民的信教似乎有些“竹林名士饮酒”的气节,看似与主流的社会整体格格不入,实际上是对整体秩序的另一种追求。这种应对性的转变表明,人们并未因此失去以往的注重整体性的某种社会秩序,似乎人们通过一些新途径把看起来被碎片化的生活插曲又相互缀连成完整的连续的交响曲。^[26]对地方性的文化来说,新途径的引入可以是文化转型的表现形态之一。信教的转变是个人自我意识中自身存在价值尺度的转变,即自身对外部世界存在的一种感知的转变。简而言之,人们在面对饮酒带来的身体危险时,无论继续饮酒,还是信教,都是人们关于自身存在与获得安全的追求。继续饮酒延续是人们以往的生活惯习,是人们保持生活的延续性与整体性的抵抗,由而实现自身在社会中的存在感。基督教是人们最容易获取的寻求自我保护的工具,是人们用来达到生理和心理安全的工具,它发挥了以往鬼神所给予人们的保护功能,并且人们又重新建构了另一种形式的整体性秩序,部分性的取代了饮酒的社会性价值,且与饮酒的行为并行于社会系统之中以保持社会体系的

① 引自衡山在云南省怒江州2012年8月14日的田野日记。

和谐运转。

四、小结

在下片马村,饮酒成为社会活动的一部分。马思中通过对佤族社会的饮酒调查指出“饮酒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性的,至少包括两种人:一方是主人一方是客人……饮用米酒通常是佤族社会关系的体现,覆盖了较有限的家庭共同体和唯一的其他类似吸烟和吃葵叶的社会行为,但这些社会行为在某些主要方面不同于饮用米酒……葵叶团,如雪茄,不是共享的,不像家庭生产的米酒——有营养又醉人的家庭生产方法通过聚在一起畅饮产生社会,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理想的社会关系的形成。佤族的酒既是‘构建一个像这样的世界’,也有些忧虑,‘世界作为希望的那样’”^[27]。对于普遍存于下片马村社会生活中的饮酒行为来说,它与相距不远的佤族社会的饮酒有些许相似,饮酒活动被人们赋予了行为的意义,人们的情感、社会的意义均可以在其中寻找踪迹。同时,饮酒生活也缔造着处于中国边缘地带的人们的整体生活。

村民饮酒不单是一种个人性的行为,它与村落的换工生产、节日习俗、休闲娱乐密切相关,是一种村民们的惯例性选择与偏好性选择交织在一起的产物。人们的生活在酒的建构下更加有序,社会结构系统的整体性更加突出。同时,这样的整体性也延续着村民的饮酒行为。正如流心关于食物的意义描述那样:超越了个人选择的主导,日积月累,为了能够与他人交流与成为这个社区的成员,人们必须学会准备食物的规则和传统。^[28]村民们饮用酒也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选择,人们日常的交往、外人的进入均处于酒所塑造的范围内。在这种相互的塑造中,人与酒产生了一种“共生性的关系”^[29]。酒在社会生活的重要位置与人们社会秩序及人们的情感依赖是互惠的,酒与村民群体成为了统一的共同体。尽管由于中缅边境划分的历史问题^①,村落由原来以茶山人为主要人口的自然村寨转变为以茶山人、傣人、白族人为主的多个民族聚居的行政村,但人们生活中依然缺少不了酒的调剂。在酒的陶醉中,本村内拥有着不同语言、文字、传统习惯的各族人民结成了一个生活的整体,而这样的生活群体的存在又满足了人们的个体情感的需要,村民有了情感的依赖或者在这个生活群体中有了所属。在马斯洛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中,他指出满

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的需要的感觉是安全感的体现,人类最重要的需要就是安全。^[30]不能不说,人们对这种情感性依赖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给村民带来了安全感。

在现代性的渗透下,酒成为个人容易获取的物品,不少年轻人外出劳动,饮酒的内容多样化,人们逐渐感受到酒的死亡风险,开始担心自己的身体和行为发生转变。人们对酒的情感也变得复杂,酒也产生由一种潜在的不安全状态而引发的焦虑感。^[31]并且在这种嗜酒的威胁下,整体的身体健康已经逐渐制约着整个村落社会的延续与发展,如嗜酒死亡者大多是四十岁到五十岁的男子,这些人不仅是家庭的支柱,而且是村内活动的重要力量,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影响较大。由而一种健康的意识也随之逐渐融入整体的意识中,人们也尽最大努力营造一个有安全感的社会。下片马村的大部分人在保持一定警觉的同时仍旧沿袭喝酒的习俗,作为一种惯例和习惯,饮酒自身也是一种充满张力的现象,闲在一起饮酒的力量被人们看做是抵抗个体无度嗜酒的手段。小部分人选择信教行为表面上瓦解了酒的社会价值,信教给予的是关于永存的期待,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不同于饮酒的另一种整体对于个体的约束,人们寻找了感觉上的安全。无论哪种选择,整体性的追求都隐藏在两种行为之中,整体性的追求便成为当地村民追求个人安全感的关键因素,它既关涉到村民生物性的身体,也关涉到内心的感觉,是个体之于社会的追求。

参考文献:

- [1] 韩胜宝. 华夏酒文化寻根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3: 8-9.
- [2] 拉德克利夫·布朗. 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 [M]. 丁国勇,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00-203.
- [3]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0.
- [4] David J. Pakin. *Palms, Wine, and Witnesses Public and Pri-*

^① 清末,片马地区成为中英界限的模糊地带。1944年5月17日,中国军队收复片马,但在英方压力下,不久又退出。1948年,缅甸独立后接管片马。1960年1月28日,中、缅在北京签订《中缅边界协定》,中国方面放弃对猛卯三角地的主权,换取缅甸政府同意将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划归中国。6月4日,缅甸正式将片马地区归还中国,由于刚刚划清界限,几乎所有片马村的村民被缅甸政府召回缅甸境内,原来的本土居民茶山人也都相应的迁移到缅甸的境内的茶山人寨子中。所以,60年代的片马人烟稀少,于是国家开始对片马大兴建设,一方面劝说迁走的村民回来,另一方面鼓励怒江州的其他民族的人民来片马建设,于是逐渐形成了现在各民族杂居的村居形态。

- vate Gain in a African Farming Community [M]. England: Waveland Press, 1994: 11.
- [5] 赵旭东. 文化的表达——人类学的视野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341.
- [6] 莫斯. 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 [M]. 汲喆,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57.
- [7]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 [M]. 渠东,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42.
- [8] 拉德克利夫 布朗. 安达曼岛人 [M]. 梁粤, 译.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93.
- [9]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107.
- [10] 皮亚杰, 英海尔德. 儿童心理学 [M]. 吴福元,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42 - 43.
- [11] Needham. *Structure and Sentiment*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8 - 12.
- [12] Needham. *Structure and Sentiment*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11 - 14.
- [13] 鲁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J]. 北新, 1927(2).
- [14] 赵旭东. 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发展——一种理解乡土中国及其转变的理论解释框架 [J]. 开放时代, 2011(12): 99 - 102.
- [15] William Bloom. *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40.
- [16] 康敏. “习以为常”之蔽——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29.
- [17] 齐美尔. 货币哲学 [M]. 陈戎女,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224 - 229.
- [18] 曹栋, 郝伟. 饮酒行为的文化心理探源 [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7(4): 69 - 71.
- [19] 郝伟. 酒精滥用相关问题及酒瘾的治疗(三) [J]. 中原精神医学杂志, 1996(4): 247 - 253.
- [20] David J. Pakin. *Palms, Wine, and Witnesses Public and Private Gain in a African Farming Community* [M]. England: Waveland Press, 1994: 10 - 12.
- [21] 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M]. 赵旭东, 方文,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1.
- [22] 乌尔里希 贝克. 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 [J]. 王武龙, 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3(3): 26.
- [23] 西敏司. 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史上地位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207.
- [24] 马克思 韦伯. 经济与社会: 上卷 [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57.
- [25] 杨善华, 谢立中. 西方社会学理论: 上卷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86.
- [26] 赵旭东. 连续的插曲与插曲的连续——吉登斯对一般功能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看法的批判 [J]. 江海学刊, 2012(2): 54 - 62.
- [27] Magnus Fiskesjo. Participant Intoxication and Self-Other Dynamics in the Wa context [J]. *The Asia Pacific of Anthropology*, 2010(2): 111 - 127.
- [28] Xin Liu. *In One's Own Shadow: An Ethnographic Account of the Condition of Postreform Rural China* [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13.
- [29] 埃文斯 普里查德. 努尔人 [M]. 褚建芳,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46.
- [30] 安丽娟, 丛中. 安全感研究述评 [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3(6): 698 - 699.
- [31] 于世刚. 确定感、安全感、控制感——人的安全需要的三个层次 [J]. 社会心理科学, 2011(2): 131.

(责任编辑: 李良木)

Drinking Behavior and the Extension of Social Integrity: An Anthropological Case Study of a Chashan Ethnic Village in the Border Area of Yunnan Province

ZHAO Xudong¹, HENG Shan²

(1.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In China, drinking has a profou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rough the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social life, it has formed a unique brewing beer culture and drinking culture. In the Southwestern borders of China, there is a large pop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each ethnic community has nurtured both generality and uniqueness of the drinking cultur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drinking behavior of local (下转第30页)

health insurance to the rural population: an impact evaluation of china's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2007: 4150.

(责任编辑: 李良木)

Measurement of Inequality in the Healthcare Finance of Rural Residence in China

CHEN Zaiyu

(*Business School,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9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China, the inequality in health and healthcare finance has aroused ever-increasing concerns of Chinese academicians. Using the data of the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 since 1993, the inequality in the healthcare finance of rural residence in China and the statistical inference are analyzed in this article. It is found that the vertical inequality (VI) in the healthcare finance of rural residence tends to be larger across income groups and has exacerbated since 1997, which strongly suggests a regressive pattern of payments for health care. In addition, the horizontal inequality (HI) in the healthcare finance of rural residence is to be smaller from the view of personal medical need, which depends on the personal health status with risk-relatedness and indicates that the lower income groups bear a higher burden of health expenditure than the higher income groups. As for the statistical inference, this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the Kakwani index of progressivity (KPI) is significant with the measuring of the asymptotic distribution-free (ADF) at the 95 percent level. Therefore, we have a good reason to argue that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has not provided rural residence with enough medical security to resolve the inequality in the healthcare finance in China.

Key words: Healthcare Finance of Rural Residence; Inequality; Statistical Inference

(上接第 11 页)

villagers, this article specifically chooses a village in this area, not to comment on the flavor or quality of each kind of liquor, but just to taste the charm of liquor in the village life. In order to get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drinking activities in the village, this article divides drinking into prescriptive drinking and free drinking, and from a variety of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s interprets the function of the liquor for individuals as well as for the overall population in the village society, and in the face of the impac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discusses how the function of liquor is transformed and how the overall system of social structure is extended.

Key words: Drinking; Prescriptive Selection; Emotion; Social Integrity; Social System